

土家族文学艺术史

修 订 稿

（下）

土家族文学艺术史編委会編

1959年7月

第三編 (1919—1949)

第一章 概論

一、时代背景

本时期土家族历史分为三个阶段：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前，革命根据地时期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。这是社会剧变的三十年，人民生活痛苦深重的三十年，也是革命的三十年。

革命前夕，封建军阀统治着土家族地区。反动军阀与地方封建势力勾结为一体，顽固地统治着各族人民。他们设置关卡，扩充武装，以增强势力，摊派种种苛捐杂税，搜括民脂民膏。为了增加税收，湘西大军阀方汉仵、陈渠珍等于1918年勒令农民种植鸦片，强迫人民吸食鸦片，致使大片良田不能生产粮食，许多人的健康受到摧残。随着中国逐渐殖民化，土家族人民受帝国主义的压榨更加严重。1924年英商直接深入鹤丰等地，开办工厂，加工红茶，廉价收购土特产，如桐油、茶叶……。另一方石大量倾销产品，洋油、洋烟、洋布……。充斥市场。大批银钱被帝国主义搜括而去。土家族人民更加贫困了。

湘鄂西自明末以来即为土匪为患的地区，入民国后，连年的军阀混战，枪枝大号遗弃，这给土匪称道造成有利条件。许多土匪世代相传，成为惯匪豪盗。他们处处抢劫烧杀，祸害人民。封建军阀、地主恶绅、流氓地痞为了更好地鱼肉人民，与土匪勾结，狼狈为奸，逐渐形成官、匪、绅三位一体的统治。

社会的大混乱、官、匪、绅三位一体的残酷统治，加深了人民的痛苦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了，人民纷纷起来暴动。1920年恩施鹤丰一带出现了带迷信色彩的“神兵”组织，它以“反对苛捐杂税，反对土匪，反对团防和国民党军队骚扰”为目的，参加

3.1-2

“神兵”的大都是贫苦农民，他们平时照样生产，一旦有事变，即鸣锣集合，扛着大刀，梭标，跟反动势力拚杀，1926年永风发生抗捐抗税的暴动。巴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取得了反对“验红契”的胜利。同年，桑植在党的领导下，成立农民协会镇压了恶霸头子朱恶农。由于党的领导，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迅速扩大起来，“其势如暴风骤雨，迅猛异常”土豪劣绅纷纷逃亡。蒋介石叛变后，1927年底党中央派贺龙、周逸群两同志到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。贺龙同志回到桑植的消息传开后，当地各族人民顿时活跃起来，奔走相告；一时聚集两千多人，土家族人民跟各族人民一道纷纷起来革命，参加革命队伍。这时活动于恩施鹤丰的“神兵”，势力更加壮大了，在工农革命军的影响下，纷纷参加革命队伍，经改编教育成为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武装。革命军经常出击，先后开辟了鹤丰、桑植两根据地，在不断胜利的基础上，由于党中央的指示1929年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。此后，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张，1934年扩大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、川、黔省，这四省边界的大块土地遂由人民当家作主了，土家族人民呼吸着自由新鲜空气。根据地展开了打土豪、分田地的斗争、苏区面积60%以上实行了土地改革。这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和阶级觉悟，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土家族人民积极地投入这一斗争，纷纷参加红军、赤卫队；妇女，儿童都组织了起来。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。龙山茨岩坎农民彭武方一家五口，都成了红军的成员。土家族人民光辉的革命业绩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。

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甘心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失败的，纠集大批人马，三番五次进攻革命根据地。因此，根据地建立不久，各族人民跟红军一道投入反“围剿”斗争。在党的战略战术的指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，打退了几次敌人的进攻，有名的赤溪河大战、十万坪大战，表现了人民革命军不可战胜的力量，给反动军队以狠狠的打击，其英勇事迹至今还在千百万群众中流传。1935年红军突围北上，登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。以后湘鄂西地区的

革命斗争转入暂时的低潮，人民又投入另一场艰苦的革命斗争。

红军北上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人民，在敌人的屠刀下，许多革命志士，无辜的人民惨遭杀害，永顺龙家寨被杀害的即有400人，永顺国民党匪帮一次就杀害了700名游击队员和革命志士。经过几次战争和屠杀之后，拥有14万人口的鹤丰县，到解放时只剩下85,000人口了。此外，国民党还从经济上进行反攻倒算，大易强夺人民财产。县长、保长、甲长，尽是土匪头子，全由地主恶霸，流氓和打手充当。他们倒行逆施，为所欲为，抓丁拉夫，派款派差，苛捐杂税，多得数不清，他们敲詐勒索，賄賂貪污。土匪則杀人放火，擄掠強姦。官、匪、壩三位一体，把整个土家族地区搞得烏烟瘴气，社会破烂不堪，生产陷于停顿状态。“有田不能耕，生机全断绝”，民不聊生。地租剝削严重，农民要把收穫量六、七成交给地主，当长工的，年终结賬，不但一无所有，还“倒欠老板三担粮”。高利貸的剝削是“六月借他三斗米，秋收要还六斗粮”。此外还有天灾，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下的土家族人民，在生命线上掙扎“灶火当棉祆，蕨根当粮草”，“清水当油，辣椒当盐，壳草当眠，合渣过年”悲惨景象，目不忍視。

然而，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，被征服、被杀绝，他们从地下爬起来，揩干净身上的血迹，掩没好同伴的屍首，他们继续战斗了”（毛主席語）红军北上后，各地党组织转入地下，秘密领导着当地人民的斗争，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各族人民纷纷集会高喊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的口号，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。咸丰县组织了“民族先锋队”广泛宣传抗日。日帝投降后，蒋介石把美帝国主义者引进土家族地区，在来凤建筑飞机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坚毅不拔的土家族人民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，又展开倒蒋爭解放的斗争。1947年巴东替国民党出差的60余人，举刀冲进保公所，杀死伪保长，并保丁四人。1944年永順、龙山、大庸、桑植等县爆发一次大规模的反对貪官污吏的斗争。次年又发生抗兵、抗粮、抗稅的暴动。据统计从

3.1—4

1945—1946，仅湘西发生的农民起义就有30多次，这就使本来极不稳定的反动政权，更加摇摇欲坠了。

在苦难的日子里，土家族人民盼望着红军归来，心里喊着共产党，他们坚信解放的一天即将到来。

二、文艺概况

本期土家族文学艺术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，政治革命引起文化革命，促使了革命文艺的诞生和发展。

革命前是革命文艺的酝酿萌芽阶段，产生于当时的作品，反映了军阀政治下的黑暗现实，觉醒了的人民与封建统治者，封建地主对立的斗争，情绪激昂愤慨，大声疾呼。主要作品有歌谣和故事。

1928年至1935年的革命，揭开了土家族文学艺术的新页。革命歌谣、革命故事传统、革命歌曲、红军宣传画……的涌现，标志着土家族文学艺术由现实主义过渡到革命现实主义。革命文艺，反映了湘鄂西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渴望，革命风暴中所取的积极拥护态度；表现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；同时，歌颂了党、红军和革命领袖；唱出了站起来了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理想，必胜的革命信念。它是湘、鄂西各族人民革命的镜子。

革命文艺不仅反映了尖锐化、表石化的阶级矛盾，而且直接参与革命斗争，自觉为革命的政治服务；紧密配合人民的革命行动，一言一语出自革命，而又无不宣传、推动、鼓舞着革命。它“作为团结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、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”（毛泽东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）发挥了巨大的教育作用，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。在革命年代里，推动、鼓舞千千万万的人民走向革命，唱着雄壮的歌声奔赴战场，振奋群众的斗志，勇敢地与敌人作斗争。红军北上后，革命文艺成为人民群众精神上的支持力量，时时刻刻念着“以后一定要团

国”“有朝一日东方红”……在国民党残酷的统治下坚持着革命斗争。解放后的今天，革命文艺帮助人们了解：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长期革命斗争的结果，是无数革命战士用鲜血换来的。从革命文艺中可以了解革命前辈崇高的革命精神，为了全体人民的解放，为了共产主义，坚贞不拔，忘我牺牲的高贵品质，从而受到革命教育，学习革命前辈伟大的人格，继承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，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。

革命文艺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足起来的，同时继承发扬了积极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，具有积极浪漫主义，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情调高昂，斗志昂扬，富于革命理想，孕育着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。

革命文艺是革命现实的必然产物。革命到来，人民的生活，思想发生新的变化，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文艺，必然为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参加斗争，并从而发生质的变化，出现新的形式。党的领导是革命文艺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。当时，党的组织配合着武装斗争、土地革命……紧紧抓着革命宣传工作，并且强调用文艺形式进行宣传。1931年中共巴东县委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中指出：“宣传鼓动工作是我们争取群众最有力的武器，确实要比枪棒子的作用大，而且可靠得多。”并且认为“文字宣传应力求简短、通俗、并艺术化，使群众容易接受。”这是指的文字宣传，文艺形式的宣传，口头宣传并未包括在内，党通过红军和宣传队伍的作用，贯彻指示，开展宣传，推动文艺活动。当时红军不仅是战斗队伍，而且是宣传队伍，红军到那里，那里就有歌声，那里就播下革命文艺的种子。红军特别是宣传队，他们不仅创作了许多具有强烈的作品如红军歌，红军宣传员，而且组织群众进行创作，组织领导人民群众的文艺活动，如唱歌、演戏、跳舞、因此、革命文艺活动得以蓬勃发足，许许多多作品在活动中孕育出来，其次革命年代里，外地革命文艺的影响，尤其是红军带来的革命文艺，对土家族革命文艺的产生，发足有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3.1—6

革命文艺中比重最大的是歌谣。这是因为歌谣形式短小，反映现实最敏感，它能把瞬息万变的现实迅速地反映出来投入革命斗争。歌谣形式多样，自由活泼、较前有所发展。其次是曲艺。曲艺形式生动活泼，随编随唱，及时反映现实生活，是人们用它来宣传革命、歌唱革命、鼓舞革命斗志、发挥了一定的战斗作用。再次是革命故事传说。传统故事不象歌谣那样容易产生、成形。有些作品是红军北上后逐渐发展完善，成熟的，解放后才广泛流传。

红军北上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张牙舞爪向湘、鄂西各族人民扑来，白色恐怖笼罩着湘、鄂西，法西斯统治窒息着革命文艺的幼苗、许多作品已散失，甚至连篇名也找不到了。但是革命文艺仍然在继续发展、好象一条红线一直贯穿下来，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文艺，反映了土家族人民的抗日要求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反抗、封建统治者的刻骨仇恨；表达了坚毅不拔的土家族怀念红军，盼望共产党，渴望解放的心声。

本时期的文艺形式除传统形式歌谣、故事传说、曲艺、戏曲小调外，还出现了新形式如前所提到的革命歌曲、宣传画、秧歌、话剧……。据“星火燎原”（下册666页）记载，大革命时期、话剧很活跃，红军自编自演，用以宣传革命，教育人民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，发挥过很大的作用。可是由于蒋介石的无情摧残许多作品（尤其是戏剧和艺术）已失传，目前保持下来的最多是歌谣，其次是故事传说和曲艺，这些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红军的创作，或者湘、鄂西各族人民的共同创作。因其十几年来，在土家族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成为土家族人民的精神食粮，斗争的武器我们是可以把它写入土家族文艺史的。再者在这三十年中，也曾产生过一些文人作品（主要是旧诗）或者反映了大革命前土家族地区混乱局面，动盪不安的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祸害；或者反映红军北上后土匪为非作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，如：“飓风不静浪难休，白骨黄沙塞外愁，时局无端多变幻，未逢七夕亦牵牛”（土

匪搶走耕牛)，還有因窮愁潦倒而發牢騷和其他的內容作品。因為作品太少，且相當粗糙，故不單獨辟章立節論述。

隨着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化，革命運動的發生發展，文藝戰線上的鬥爭必然會尖銳化、複雜化。本時期的兩種文藝的鬥爭由民主主義的文藝與封建文藝的鬥爭，發展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文藝與反革命文藝的鬥爭；由自發的鬥爭發展為自覺的鬥爭。當宣傳革命，歌頌革命、歌唱紅軍的革命歌謠，曲藝、大鼓產生、流傳的時候，反动統治階級唱出了反动歌謠，與革命文藝對抗。“紅軍好煮飯”便是誣蔑紅軍、咒罵紅軍的反動歌謠。他們還創作歌功頌德，充滿封建迷信色彩的作品，企圖以之瓦解人民的鬥志，解除革命思想武裝，篡改人民的作品是反动階級慣用的手段，如“遼東 P a p u 神下凡”這個富有神話色彩的傳說，本來的意思是：紅軍和匪軍作戰，正在決定勝負之際“P a p u 神”（土語 P a R u 即將軍之意）聞訊，披甲負劍下凡，協助紅軍取得勝利，這表明了人民支持革命，支持紅軍的良好願望。但是，反动階級顛倒黑白，把“P a p u 神”改為成幫助軍閥鎮壓人民的工具，善神變成惡神；“被人民所愛的，必然被反人民的所恨，這是很自然的事情”（聞一多語）。然而在無產階級領導着革命，革命文藝蓬勃發展的年代里，反动階級的上述手段，不會收得大的效果。於是使用政治暴力摧殘革命文藝，這在白色恐怖時期，尤其表現得瘋狂。人民群众的文艺活动被禁止，国民党利用“摆手”时群众集会，大抓壮丁，迫使停頓“摆手”活动，使“摆手堂里长青草”。外地传入的进步书籍如鲁迅的“中国之一日”也被列入禁网。在反动统治者的无情摧毁之下，土家族文艺遭受严重的损失。更重要的是经过了一次严重的考验，使之在斗争中变得更坚强茁壮。

第二章 革命根据地建立前的文艺

革命前，土家族地区社会非常混乱，封建军阀、地主豪绅、土匪互相勾结，狼狈为奸，鱼肉人民；枪劫烧杀，奸杀掳掠经常发生。人民生活痛苦不堪；反压迫反剥削的呼声此起彼伏，一场猛烈的革命风暴，正在酝酿中。本阶段的文艺就是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激烈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，集中地反映了社会的主要矛盾，即人民对军阀、土匪、地主豪绅的反抗，同时也反映了突出的社会问题——鸦片之祸害。从人民群众对这个罪恶社会的控诉中可以看出统治者、剥削阶级的罪行及其垂死的命运；也可以看到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和革命意识的增长。

本阶段的文艺有着深刻的思想性，不仅直接地反映了社会的基本问题，而且指出了它的本质，这在歌谣中尤其表现得明显。如民歌“要想做官，拒枪上山；政府招安，就做大官。”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官、匪和政府之间的黑暗内幕，不可分割的“血缘”关系。又如民歌“月亮弯弯一盏灯，老板压迫到如今，有朝一日太阳出，剥他皮来抽他筋。”。在这歌谣中，人民不仅明确了斗争的目标，并且坚信革命的一天终会到来，从而狠狠地惩罚统治阶级、剥削者。这种坚强的革命信念，大声疾呼的斗争精神，在这之前的文艺中是找不出来的。可见，本阶段的文艺较前期有较大的发展，是革命文艺的萌芽。

自“五四”至革命根据地建立为期不长，产生的作品不多，流传保存下来的更少，曲艺、戏剧、艺术尤其难以找到。目前，我们所掌握的主要有歌谣、故事。作品虽然有限，但思想性艺术性相当高，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。

一、歌 谣

在阶级斗争剧烈的年代里，人民用歌谣作为便利的武器进行

战斗，在斗争中它所发挥的作用既大，本勇所取得的成就也就辉煌。本阶段的歌谣，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，反映了人民群众所受军阀、土匪和地主豪绅的奴役的痛苦，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毒物——鸦片带来的祸害；真实地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剥削者的深仇大恨及反抗，同时也歌颂了人民的斗争精神。

揭露土匪为害的歌谣

湘鄂西自明末以来即为土匪为害的地区。辛亥革命后，在军阀混战局面中，土匪趁势扩大势力。他们明目张胆地白昼抢掠，黑夜杀人，并且私设关卡勒索税款。在土匪的骚扰之下，社会昏暗之极：

NB

天上星多月不明，地上坑多路不平，
坑里鱼多水不清，土匪多了不太平。
土匪来了人不安，白天黑夜躲上山，
受了几多急风暴雨，躲了几多大雨床。

土匪横行霸道，胡作非为，处处杀人放火，抢掠掳掠，足跡所到之处，被洗劫一空，甚至整个整个村寨变成瓦砾场。民国九年，来凤百福司曾遭此大难。土匪为患致使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；为了免除杀害，老百姓白日黑夜，逃进深山密林之中，无衣无食，睡在暴风大雨之下，苦不堪言。良田沃土荒凉地抛在日月不明之中。土匪过后，回得家来，房屋变成废墟，粮食、耕畜、农具化为乌有，无安身之所。生活尚难维持，更无力生子，致使生产破坏。为挽救死亡，不得不卖田卖地，甚至卖儿卖女；或者离乡背井，觅食异地。对于土匪的滔天罪行，人民恨之入骨，发出控告。即使是生活清闲的教书先生，也唱出这样的声音：“抢了财物又放火，应该捉来下油锅。”土匪虽兇恶的，但人民并没有被他们吓服；组织起来跟他拼杀。当时以土匪为反对目标之一带有迷信色彩的“神兵”组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除武力反抗外，勇敢的土家族人民还跟土匪舌战，指着土匪的鼻子痛骂：

白喊“哥哥”莫骂人，四人打牌四人赢，

刮的穷人钱和米， 输的桌子和板凳。

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：农民田某双目失明，帮人舂米为生。一群土匪在田某的老板家里打牌，匪班长输得心烦意乱，討厭石臼声响，以影响他们的打牌为口实，破口大骂。这位姓田的农民，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，手指土匪班长鼻子，赤痛骂还击，并当场唱出了这一首歌。这首歌虽临阵交锋，刀枪交加撞击出来的火花和响声，战斗性特别强烈，怒气横生地指出了土匪的掠夺本性。他们抢劫人民的钱和米，以为玩乐。赌钱、打牌，输了则大发牢骚，向人民出气，就可忍孰不可忍？作者当着一群强盗正颐养色地给土匪以还击，扫掉了他们的威风。这表现了主家族人民敢于和一切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的高贵品质。“输的桌子和板凳”这一句平常而又惊人的歌句，不但思想内容很深刻，而且勾画了一群土匪横暴子、摔板凳狗咬狗的丑相。

看到这里，人们不能不问，为什么土匪这样多，如此猖狂，下面的话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：

要想当官，抱枪上山；政府招安，就做大官。

有枪就有势， 有势就有官。

原来是这样的，当土匪是做官的阶梯，通向有权有势的高官大门的必经之路。因此涌现出许多土匪。封建统治者，为了保护他们日落西山的命运，搜罗一切反动势力，以充实统治力量。用“招安”的名义，收容土匪，並封以官衔，使之成为他们的爪牙保护力量。于是官和匪及地方反动势力，结成反动阵线，象链条一样紧勒着劳动人民。土匪、官和政府之间有着密不可分“血缘”关系，他们互相依靠，互相利用；政府、官培植土匪，利用土匪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；土匪和地方反动势力以官、政府为靠山，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，任意践踏人民。官和土匪，二而一，一而二，身分互相转化，其操纵杆是反动政权。作品在这里把土匪猖獗的根本原因、社会的本质，公布于世。这表明人民已经明确了打击的根本目标。它告诉我们，只有推翻反动政权，才能消灭土匪的祸害。

諺語形式短小精悍、一針見血，击中要害，以辛辣的諷刺，確當的語言，道出了反動軍閥統治的本質，打擊力很重，戰鬥性很強，因而教育作用很大，很能启发人民的階級覺悟。

反映封建剝削下人民的痛苦生活

及反抗統治者的歌謠

軍閥混戰，土匪的燒殺，和封建地主的剝削，致使許多農民破產，土地愈來愈集中到少數人手里。許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為了生活，不得不租種地主的土地。辛勤勞動的土家族人民“一年四季弄泥巴”，但勞動果實，被地主剝削而去，終年勞動，不得衣食。

月亮出來亮堂堂， 照在田中谷子黃，
金黃谷子歸老板， 窮人不得一粒糧。

詩歌的前兩句描寫金黃的谷浪。農民、田中金黃谷子的生產者，在亮堂堂的月光之下，望着肥壯壯的閃閃發光的谷子，一年的辛勤勞動眼看就有收成了，充滿着喜悅，人物的心情和具體的果實交融在一起，恰到好處地表達了農民在秋收前的思想感情。可是一想到“金黃谷子歸老板”的時候，感情急轉直下。一年的流汗流血，換來的是一場空，這金黃的谷子將被老板奪去，收穫之後，仍然挨餓。“窮人不得一粒糧”，地租剝削達到如此驚人的程度！後兩句唱詞是悲沉的，這悲沉的聲中，蘊藏着不平的怒火，傾訴不完的深仇大恨。

人民遭受着飢餓，不得不借貸，這又卷上了高利貸的剝削圈套。

桐子開花就記債， 有钱人家狠心腸，
六月借他三斗米， 九月還他六斗糧。
年成荒了几吃虧， 窮人年年把賬增，
七年八年還不起， 房屋田地化為灰。

這是對高利貸者的控訴。高利貸者乘人之危，謀取暴利，利上加利，息上生息，債主無法償還，於是年年增賬，包袱愈來愈重，

七年八年之后，再也糊不动了，整个家财被高利贷者吞食掉，“房屋田地化为灰”。他们一步步把贫苦的劳动人民逼上破产、死亡的道路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成群的人不得不出卖劳力，谋求生存。生活又把他们赶进另一座鬼门关：

N 贫穷不过我贫穷， 没有吃穿当长工，
B 早晨不等鸡开口， 夜晚要等鸡上笼。

十冬腊月吹雪风， 无田无地当长工，
岁岁吃的猪狗饭， 夜夜睡的牛马棚。

老板无事出门嗨， 吩咐长工把轿抬，
活人当猪牲口用， 口口声声骂奴才。
长工把轿抬起来， 浑身汗水浹背流，
老板坐得凉悠悠， 长工何日得出头。

这些歌谣，在我们的面前，展开了一幅长工生活的悲惨图景。他早出晚归，成年累月，不论是大火热的夏天，还是冰天雪地时寒冬，风里雨里受煎熬，受折磨；吃的猪狗饭，睡的是牛马棚，犹如牛马一般。而老板呢？“富豪身穿红缎袄”，饱食终日，过着荒淫的生活，闲得无聊时，“吩咐长工把轿抬”，出外游逛；在烈日之下，抬轿的长工，压得“浑身汗水浹背流”劳累的老板则凉悠悠。对长工的苦楚，非但不半点同情之心，还“口口声声骂奴才”，这是怎样的世界？封建势力这一座大山把千百万劳动人民压在社会的最低层，他们呼喊：“长工何日得出头？”这是抗议的声音，诅咒的声音，也是追求出路的声音。

残酷的压迫，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，纷纷起来反抗，农民暴动此起彼伏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，随着革命的到来，人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，革命意识日益增长。有些歌谣，直接唱出了人民的斗争和报仇的愿望。给地主少爷的儿曹唱道：
：“眼看太阳落了西，老子把牛赶回去，老板老财长和短，算起（赌气、壮着胆子）和他扯场皮”。从这首歌谣中我们看到了一

个自称“老子”，一点也不害怕老板，准备跟老板“扯皮”，坚强的反抗的形象，长期受欺压迫长工，朴发出了仇恨的怒火：

NB

月亮弯弯一盏灯，老板压迫到如今，

有朝一日太阳出，剥他皮来抽他筋。

人民坚信，黑暗的社会一定死亡，无明的世界必将来临。长期压迫、剥削劳动人民的老板，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

反映鸦片的毒害及人民反对鸦片的歌谣

大约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，帝国主义带来的毒物——鸦片就传入土家族地区，从那时起，土家族人民就开始受鸦片之毒害。民国初年，封建军阀以为有利可图，下令强令人民种植鸦片，大片良田沃土被用来种植罂粟，吸食者亦愈来愈多，对人民的毒害愈来愈深。鸦片损害了人民的健康，夺去了吸食者的家财。因而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志，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，成为文学的重要主题。

鸦片大烟吸吸吸，

吸得田地吸了坡，

田地山坡吸尽了，

吸掉脚边热和和（妻子）。

鸦片烟，五色花，

劝你哥哥莫吸它

为姐不是黄怪里，

又败身子又败家。

前首有高度的概括性；三言两语就把鸦片这个毒物带来的害处及其所产生的摧毁力，集中地反映出来，而且生动形象。开头一句用三个“吸”字来描写抽大烟的声音，二、三、四句都以“吸”字做动词，表示抽大烟者的财产和妻子就是在这“吸吸吸”的声响中毁掉的。因此有很大的告诫力，引起人们对鸦片的警惕。后首进一步从鸦片的毒害出发，以亲切的口吻、体贴入微的细腻感情，表“劝你哥哥莫吸它”。劝戒无力，则对吸大烟的人进行有力的嘲笑和讽刺。如：

站在那里象青砖，

脸上吃得象黑官，

若是哪天没吸到，

呵欠扯到耳朵边。

作品描写了抽大烟着面黄肌瘦，没有烟抽就流鼻涕，落眼泪。“呵欠扯到耳朵边”的可憐相，这种描写是有讽刺和嘲笑意味的，但并非恶意的打击其人，而是从善意出发，希望人们从这可怜相中，认识鸦片的危害性，赶快觉悟起来，摆脱鸦片的毒害。

从以上的分析中，可以看出，本阶段歌谣的几个特点：

一、深刻地解剖现实，鲜明的对比性的揭露中闪耀着大胆控诉的火光，勇敢地反映现实，追求出路，并且坚信“有朝一日太阳出，剥他皮来抽他筋”。二、情调高昂，无情的怒潮如汹涌澎湃的黄河，咆哮的声音震撼着黑暗的大地，旧世界的帷幕即将下落，出现新的曙光。三、直截了当，语言铿锵有声，狠狠地打击着恶势力的封建势力及其他一切反动力量。

二. 故 事

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，人民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，出现在故事中的阶级斗争很激烈，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对阶级敌人的反抗力极大，有时还取得斗争的主动权，灵活地还击敌人，使之哭笑不得，狼狈不堪。从《田老楚和向桂芝》《第二哥》两个真实的故事中，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两个方面。

《田老楚和向桂芝》，田老楚和向桂芝是一对贫苦的情人，地主田大胖子看上了向桂芝要把她夺去做小老婆。“出嫁”的前一天，桂芝、老楚逃至山头，歌唱一通宵，互相倾吐真挚的爱情，哭诉不幸的遭遇，咒骂吃人的封建社会。他们唱道：“生不离，死不离，除非山中虎脱皮，铁树开花岩结子，海干龙现不分离”。唱完歌后，两人一条绳子挂上树枝，双双而死。故事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罪恶。在那个社会制度之下，有权有势者，不仅残酷剥削人民、压迫人民，而且可以利用权势，夺走受欺压者的人身，破坏他们的婚姻，摧毁他们的生命。田老楚和向桂芝的死，是社会造成的悲剧，但不是对恶势力的屈服，而是血的控诉，肉的反抗。它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社会的罪恶，从而更加痛恨那个罪恶的社会，更强烈地反抗那个吃人的社会。故事的另一方面，

3.2—8

歌颂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和坚贞专一的爱情。田老英和向桂芝有着共同的命运，共同的生活基础，因此感情很巩固，他们能热烈地相爱，也就敢大胆的反抗破坏他们的幸福的恶势力，勇敢的以死对抗强敌。这种“宁为玉碎，不作瓦全”的高贵品质，是极为可歌可泣的。

《田老英和向桂芝》故事中，劳动人民还处在被损害的地位，而在《覃二哥》故事中，则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，其思想性、社会意义更为深刻。

地主婆母夜叉科长工极为刻薄、毒辣，天不亮就喊上工，天黑了才叫收工，有时还要长工同时做两样活。长工覃二哥不服虐待，跟母夜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他慷慨地立断碗，以巧妙的回答抵拒出早工，使得地主婆无言以对。最后一场斗争是这样的：母夜叉吩咐覃二哥次日交半亩西山砍柴，西山的一大片松林就是地主的命根子；覃二哥到西山之后一把火将松林烧起来，滋滋的火猋，炮竹般的响声，惊动了母夜叉，她连爬带滚走上山去，破口大骂，覃二哥却若无其事的说：“乌黑乌黑的，我还没亮割了手指，那个锅就当长年？”母夜叉气得直蹬脚，望着呼呼的大火，叫天喊地。

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，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，看透了压迫者剥削者的本质，并且掌握了他们的既刻薄、狠心而又愚蠢的本性。因此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，胸有成竹地对付敌人、还击敌人。母夜叉的失败，代表她那个阶级没落的命运，即走上死亡的道路；覃二哥的胜利，代表着人民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，斗争力量的壮大。故事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勇敢、机智、反抗斗争精神。

故事成功地塑造了覃二哥的形象。他勇敢、聪明，不畏强暴，随时随地灵活地针对敌人的薄弱环节，致命之所在，投枪以刺，还击敌人，并且一发即中；结果，狠狠地打击了地主。显然劳动人民在塑造覃二哥这个人物形象时，是把它当作自己心目中的代表和学习的榜样的。因此，劳动人民的许多优良品质都集中在

算二哥的身上。故事的人物描写有血有肉，绘声绘色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请看下面一段有趣的情节：

……半夜过一点，母夜叉就喊起床：“算二，快起来，种阳春去。”算二哥哼了一声，动也不动。母夜叉又喊起来：“起来，快点！”算二哥哼了两声，还呆没有起来。母夜叉发火了：你到底起不起来，”“我在捉虱子，”算二哥回答。母夜叉听了算二哥的话更火了：“天都没亮怎么看得见虱子呀！”算二哥瓮声瓮气地回答：“天都没亮，怎么能种阳春！”……

《算二哥》的故事是一些生活细节的组合，缺乏统一完整的情节，但很吸引人。从摔碗开始，斗争的场面一次比一次紧张，一次比一次深刻，步步走向高潮；我们为敌人的节节失败算二哥的节节胜利而喝采。最后，在一个火光冲天、平时光恶到了极点的敌人呼天喊地、狼狽不堪，我们暗暗欢欣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中结束。